

全球发展失衡和 中韩经济政策

—2007年中韩经济合作研讨会文集

王一鸣 主编



中国计划出版社

全球发展失衡和 中韩经济政策

——2007年中韩经济合作研讨会文集

王一鸣 主编

中国计划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全球发展失衡和中韩经济政策: 2007 年中韩经济合作
研讨会文集/王一鸣主编.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80242 - 253 - 7

I. 全… II. 王… III. 国际合作: 经济合作—中国、韩
国—文集 IV. F125. 531. 2. 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6017 号

全球发展失衡和中韩经济政策

——2007 年中韩经济合作研讨会文集

王一鸣 主编

☆

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11 号国宏大厦 C 座 4 层)

(邮政编码: 100038 电话: 63906433 6390638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880 × 1230 毫米 1/32 5.25 印张 131 千字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

ISBN 978-7-80242-253-7

定价: 12.00 元

目 录

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王一鸣 叶辅靖 (1)
全球经济失衡及东亚地区储蓄—投资差距问题	吴龙协 (16)
全球失衡中的中国经济和东亚经济	张燕生 (29)
对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和韩国经济的选择	金博洙 (40)
世界经济失衡及中韩经贸关系	张蕴岭 (47)
韩国的对华贸易现状和展望	杨平燮 (59)
中韩自由贸易区敏感产业安排的试分析	刘翔峰 (67)
韩国的自由贸易 (FTA) 政策：当前情况和 未来前景	宋柏勋 (77)
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经验及与韩国的比较	宋 立 (83)
韩国金融开放政策的经验和启示	尹昌仁 (92)
从管理浮动到自由浮动：韩国汇率制度转型的 经验及启示	曲凤杰 (99)
韩国的汇率政策	申宗协 (113)
中韩海外投资政策比较	汪文祥 (120)
韩国的海外直接投资现状及政策	李晟凤 (129)
中韩两国产业合作前景研究	曾智泽 (143)
韩国产业的发展战略	洪裕洙 (153)

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王一鸣 叶辅靖

全球经济失衡是近年来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而且对全球经济发展具有全面和深刻影响的现象。全球经济失衡是“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必然产物，也是全球化进程中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中国在加入 WTO 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在参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中，受到自身要素禀赋和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在全球经济失衡中扮演着特有的角色。改变全球经济失衡需要相关各方作出积极的努力。中国也将通过自身的努力着力解决经济对外失衡问题，为调整全球经济失衡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特征

全球经济失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一个新概念。2005 年 2 月 23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正式使用了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一词，意指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这些经济体的外部失衡问题之所以被称为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是因为其影响具有全球性。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美国经常账户逆差迅速扩大，经常项目逆差呈现向美国集中的趋势。1997 年以前，美国经常项目的逆差相对温和。自 1998 年特别是 2001 年以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日趋严重，从 2001

年的 3889 亿美元迅速扩大到 2006 年的 8567 亿美元, 相当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 3.8% 上升到 6.5% (见图 1)。这说明美国需要利用的外部融资越来越高, 外部储蓄将更大规模地流入美国。伴随着经常项目逆差的不断扩大, 美国净外债余额相当 GDP 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目前美国的外债总额已经达到 13 万亿美元, 美国的净外债相当国内生产总值的 26%, 相当于世界生产总值的 8%。在现有国际主要货币的汇率不变的情况下, 到 2011 年, 美国净外债相当全球 GDP 的比例将高达 15%, 相当国内生产总值的 51% 以上。如果美国的负债率达到这样的高度, 外国投资者对美国资产的信心将出现严重的危机, 届时美国能否吸引到足够的外国资本来保持经常项目的平衡将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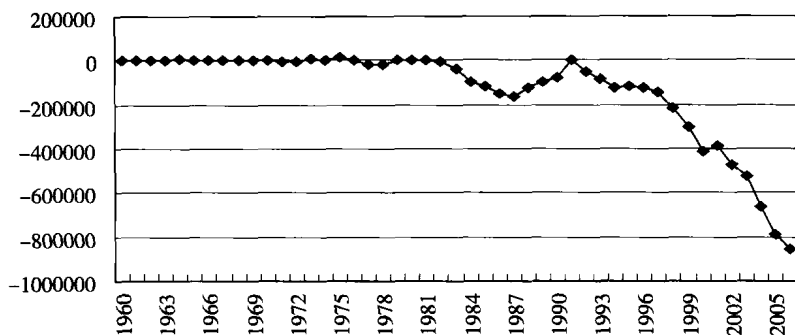


图 1 1960 - 2006 年美国经常项目余额 (单位: 100 万美元)

资料来源: 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绘制。

第二, 东亚地区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经常项目顺差向东亚地区集中。全球经济失衡的另一个方面, 是全球经常项目顺差日益向东亚地区集中。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 2006 年中日韩作为整体, 经常项目顺差达到 4149 亿美元, 其中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为 2385 亿美元, 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9.1% (按照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 2006 年经常项目顺差 2498 亿美

元)。如果加上台湾、香港,中日韩经常项目顺差更高达 4594 亿美元。除了东亚之外,中东石油输出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也十分庞大,2006 年达到 2124 亿美元,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国际石油价格高涨,石油输出国的石油收入大量增加,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石油进口成本迅速上升,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贸易收支的不平衡。

二、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和对中国的影响

全球经济失衡是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必然产物,全球化进程中的产业转移以及由此形成的国际分工新格局也是重要因素。

(一) 全球经济失衡是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必然产物

二战以来,尽管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其核心的内容一直未能根本改变,那就是美元充当头号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没有根本动摇。由一个国家的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必然无法解决满足世界流动性的需要与美元信心之间的特里芬难题^①,即为了满足世界其他国家美元储备不断增长的需求,美国必然会出现国际收支逆差;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增加又会有损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信心。这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美元与黄金的脱钩,并没有

^① 特里芬难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承担着两个基本的职责,一是要保证美元按固定官价兑换黄金,以维持各国对美元的信心,保证美元价值的稳定;二是要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国际清偿力,即美元。然而这两个问题,信心(价值稳定)和清偿力却是有矛盾的,美元过少会导致清偿力不足,美元过多则会导致美元价值的不稳定,出现信心危机。原因在于,美国若限制输出美元,国际货币体系就会面临国际货币的数量短缺,而要继续不断地向其他国家提供美元,只能让自己的国际收支始终保持赤字,但是,收支赤字却意味着美元无法稳定。关于清偿力和信心之间的这种两难境地,最早是由特里芬提出的,因此被称为“特里芬难题”。实际上,由任何一种主权货币来充当唯一的国际货币,特里芬难题都是存在的。

动摇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它仍是全球广泛接受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储藏手段。全球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的扩大、跨国金融交易的增长都要表现在美国境外的美元需求上。因而，只要美元仍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那么，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交易的扩大，必然要求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增大，这就是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症结所在。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早已解体，但不仅没有解决国家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必然存在的内在利益冲突问题，相反为美国利用这种软约束的货币体系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发行美元，还要受到黄金兑换的约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任意发放货币、实行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受到的外部制约更少，通过超额发行货币，不仅可以提高美国自身的福利（因它可以用本国的货币购买全球的资源），维持国内的低实际利率，而且由于60%的美元钞票在美国之外流通，相当数量的美元资产由外国人持有，它还可以将金融风险分散到其他国家、分散到全球市场，让所有的国家、所有的经济体都来为美国负担风险。这也可以从美元贬值的不对称性上看出来。别的国家的贬值就表明外部资产价值增加，而内部资产缩水。对于美国而言，贬值则意味着外部资产价值上升，而国内资产不变。可以说，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既有必要，也有动力在一定的限度内不断扩大国际收支逆差。

（二）全球经济失衡是全球化进程中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

国际货币体系回答了全球失衡的一个方面，即美国为什么有不断扩大逆差^①的内在冲动以及其他经济体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顺

^① 从理论上说，国际收支逆差既可以是经常项目逆差造成的，也可以是资本金融项目逆差引起的，但从国民福利的角度看，经常项目逆差带来的是物质的、实际的福利，因为它意味着利用了外部的实际资源。

差的问题，但没有回答顺差为什么高度集中在东亚特别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均匀地分散在不同国家。这需要从全球化条件下的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的角度来解释。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产业内甚至产品内的分工日益代替传统的产业间分工。在这种分工格局下，贸易结构不再是国际分工的标志，生产要素的国际差异才是国际分工的基础与核心。要素流动促进了跨国外包的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的延长，产业转移导致了国际分工新格局的形成。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是产业转移的主要源头。20 世纪 90 年代，以知识经济、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新技术革命创造了美国的“新经济”，知识的创新促使美国产业结构呈现强烈的服务化和高新技术化特征，同时，其制造业加速向外转移，把制造环节和部分服务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国对外开放恰逢全球化的新阶段，在改革开放伊始就采取了鼓励出口和鼓励吸引外资的政策，加上中国经济规模和市场潜力大，自然就成了许多跨国公司实行外包和离岸生产的首选。

正是这种分工格局和产业转移造就了全球经济失衡的基础：一方面由于生产加工能力以及出口能力向后进国家转移，使中国等拥有了低劳动力成本进行生产出口的相对竞争优势，从而集中形成大量的贸易顺差；而另一方面，由于美国高技术以及知识经济的高速发展所形成的产业优势只有一部分可以从其服务贸易中得到反应，而其他部分则具有不可贸易特征，只能为本国的服务业所吸纳，因此，美国的优势产业不能完全显示其创造服务贸易顺差的能力，而大量转移的一般型制造业，则带来大量的贸易逆差，造成了经常项目的赤字规模日趋扩大。由于美国拥有技术、标准、品牌、跨国企业组织等生产要素并控制着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有贸易逆差，但却控制着利益和金融财富分配，使美国在不

带来通胀的情况下扩大了需求，从国际投资中得到了更多的财富，从而导致更高的消费。

作为两个主要当事方，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失衡中的利益分配也是严重失衡的。中国虽有巨额顺差，是世界第三大净资本输出国，但长期以来（个别时期除外）中国的投资收益都是负数。其原因是作为外汇储备主要形式的美国国库券收益率只有 3% ~ 5%。而目前累计量已经超过 6000 亿美元的 FDI 的回报率比美国国库券收益率要高得多。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过大，不仅是以穷国的储蓄支撑富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严重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还要面临美元贬值的巨大风险。美国虽有庞大的逆差，但不仅以其逆差占有全球的物质资源，并支撑其消费，而且以逆差获取低成本的融资支持，弥补其储蓄不足。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但美国的投资收益一直是正数（2006 年除外）。这就是说，中国是债权国，但要付给债务国利息，而美国是债务国，却能从债权国收取利息。

三、中国和东亚地区在全球经济失衡中的作用

近几年来，东亚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增加，外汇储备规模不断扩大，从 2004 年的 24900 亿美元增加到 2006 年的 32160 亿美元，中日韩三国占整个东亚外汇储备的 68%。特别是中国的外汇储备自 2002 年以来以每年增加 2000 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在东亚和全球贸易顺差中所占份额迅速增加（见表 1）。

表 1 亚洲官方外汇储备

（单位：10 亿美元，期末）

国家（地区）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亚太工业化国家	888	899	964
日本	845	847	895
澳大利亚	37	43	55

续表

国家（地区）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新西兰	7	9	14
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地区）	1601	1851	2252
中国	619	826	1073
中国香港	124	124	133
中国台湾	242	253	266
韩国	199	210	239
新加坡	113	117	137
马来西亚	67	70	83
印尼	36	35	43
泰国	50	52	67
菲律宾	15	18	23
越南	6	9	11
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677	705	755
东盟五国	174	184	227
东亚	2490	2750	3216
中东	247	351	477

资料来源：IMF，APDCORE database.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最重要的来源地之一，虽然由于统计口径等方面的原因，中美双方在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统计上相差近 1000 亿美元。按照美方的统计，2006 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 2326 亿美元，占美国贸易总逆差的 27.8%，而按照中方的统计，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仅为 1442.6 亿美元，占中方贸易总顺差的 17.2%（见图 2、表 2）。我们暂且不论造成这种统计差异的原因，以及以不同国家的数据为基础衡量的全球经济失衡可能存在的巨大差异，仅就中国不断扩大的经常项目顺差而言，也并非出于自身的愿望，而是由全球分工格局和东亚区域分工体系所决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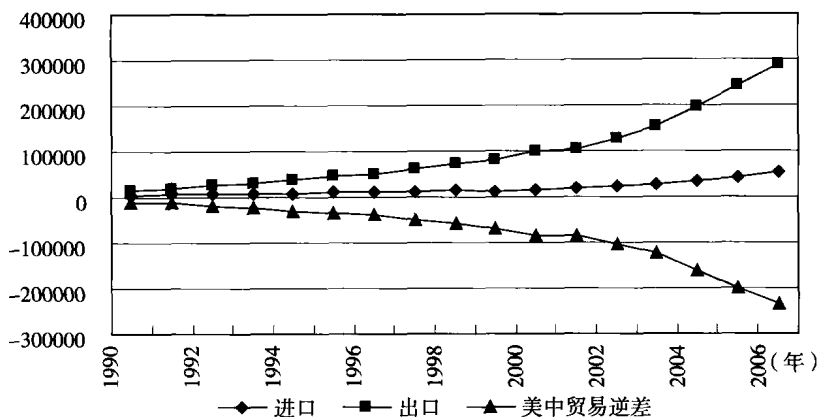


图2 1990~2006年中美贸易情况 (单位: 百万美元)

表2 近年来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统计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美国总逆差	美国统计对华逆差	比重	中国统计对美顺差	比重
1996	1684.48	395.17	23.4	105.30	6.2
1997	1826.15	497.47	27.2	163.97	8.9
1998	2334.11	568.98	24.3	210.15	9.0
1999	3319.45	686.68	20.6	224.66	6.7
2000	4364.69	838.10	19.2	297.41	6.8
2001	4109.33	830.46	20.2	280.80	6.8
2002	4702.91	1031.15	21.9	427.20	9.0
2003	5356.52	1239.61	23.1	586.13	10.9
2004	6531.26	1619.78	24.8	802.69	12.2
2005	7665.61	2016.26	26.3	1143.00	14.9
2006	8359.66	2327.41	27.8	1442.60	17.2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 历年中国海关统计。

从各方面看,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与日、韩国等国的顺差有很大区别, 主要表现在:

第一, 中国的顺差多数是由外资企业实现的。2006年外资企

业实现的贸易顺差为 912 亿美元，占中国贸易顺差的 51.4%。与日本、韩国直接由本国厂商利用在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获得的贸易顺差不同，中国贸易顺差中有一半以上是由日本、韩国、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实现的，只是在现有的统计方法上把这些国家的顺差算作了中国的顺差。

第二，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与日本、韩国等国出口中包括大量零部件、半成品在内的资本品不同，现阶段中国主要是通过进口资本品，利用加工贸易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的最终消费品。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06 年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 53%，占进口的 40%，加工贸易实现的顺差占总顺差的 106%。由此可见，加工贸易已经成为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

第三，中国在东亚区域分工体系中发挥着集散地的作用。从地区上看，中国对美国等国的贸易顺差是以对日本、韩国、东盟等地的贸易逆差为前提的。2006 年中国与日本、韩国、东盟的贸易逆差分别为 241 亿美元、453 亿美元、182 亿美元。这也说明，中国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优势，使得原本由东亚国家向美国出口的最终产品，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中国进行加工生产，结果必然是中国对美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东亚经济体对美的出口。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东亚地区已经形成了新的区域分工体系，其表现形式是，东亚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向中国出口资本品（包括零部件、中间产品以及部分原材料），在中国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口最终制成品，由此形成了以东亚为零部件供应方、以中国为加工制造基地、以美欧为核心技术研发方和主要市场的产业分工格局。中国在东亚区域分工体系中扮演着集散地的角色，中国成为东亚地区资本品的集聚地、最终产品加工生产地和出口原产地。中国在东亚区域分工体系中的角色变化，推动了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结构调整和贸易模式变化。

换言之，中国对美出口中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本、韩国等国的出口，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的是东亚地区的生产和出口能力。正因为如此，中国贸易表现出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竞争力，以及他们与美国的竞争关系，只不过这种竞争过去是在他们本土上表现出来的，但现在在转到中国来进行。由此可以推断，中国贸易顺差扩大并不表明产业竞争力有了根本提升。

四、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

对于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目前仍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不可持续的。这种观点的主要根据是，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与 GDP 的比率高达 7%，这意味着美国负债率高达 150%，而公认的安全线是 20% ~ 30%，因此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第一，投资者不会对美国如此之高的风险视而不见，第二，从政治上看，美国也不会接受其近一半的生产性资本存量被外国人持有。因此，调整是必然的，只是不能预测是以渐进的“软着陆”方式进行调整，还是采取突然的“硬着陆”方式进行。另一种基本观点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可以在不引发大的灾难的前提下持续更长时间的。主要观点包括新布雷顿森林体系说，这种理论认为，1945 年到 1970 年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在复活，只是角色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心国家仍是美国，但是外围国家由欧洲、日本变成了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与旧体系一样，这些外围国家为了赶超，一直实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为此，实行汇率低估和资本管制政策，其必然结果就是低收益外汇储备的大量累积。这等于是对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提供融资的正式承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将持续相当长时间，一直持续到中国 2 亿农村劳动力全部为现代出口制造业所吸纳为止。这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新经济说认为，由于美国是新经济的领头羊，其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无国能望其项背，其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and 公司盈利能力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外国投资者对美国资产的需求不可能发生大的逆转，不会大规模撤资，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是有融资保障的。

我们的判断是，全球经济失衡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但面临的潜在风险越来越大。

（一）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难以在短期内根本改变

美元本位的国际储备体系虽然正在发生变化，并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但远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元的霸主地位。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主观上会极力维护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而且在客观上暂时还不可能出现能够全面取代美国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欧元、日元地位的提高，需要日本、欧盟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拉动有突出表现，而 1990 ~ 2004 年，美国经济累计增幅达 45%，欧洲和日本经济分别只有 29% 和 25%，中国、印度乃至亚洲取代美国更需假以时日。

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存在，既决定了其国际收支逆差的长期性，也决定了为了维护美元的信心，其逆差必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但对于外部能容忍的最大限度，我们不能用衡量其他国家的通常指标来衡量美国。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有 3% 或 5% 的贸易逆差，3 年就要发生金融危机了，而对发行国际货币的美国来说，7% 的逆差可能可以支撑 10 年，这种不均衡可能就是在不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的一种均衡，它就是以美国有逆差、其他国家有顺差为特点的。在目前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全球经济失衡仍会持续下去。

（二）产业转移和中国等国的低成本优势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尽管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存在许多问题，由此带来的资源环境和社会压力也越来越大，战略调整的步伐正在逐步加快，效应也在逐步显现，但是由于中国等东亚国家经常账户顺差产生的根源，是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产业转移和新的国际分工，而迄

今为止，国际国内产业转移方兴未艾，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仍在确立之中，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在中国形成的生产和出口能力正在释放之中，支撑这样一种产业分工格局的是中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目前，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继续存在，每年新增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人数仍维持在400万~500万左右。这决定了未来中国贸易顺差将会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存在。虽然东盟、印度、巴西等国正在稀释中国的加工出口能力，但在低成本出口方面，短期内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具备中国的规模从而取代中国在全球失衡中的地位。因此，作为全球失衡另一面的东亚顺差趋势和顺差格局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扭转。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但潜在的风险正在加大。

五、中国经济对外失衡和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在全球经济失衡的总格局中，中国属于储蓄大于投资，因而对外贸易长期顺差、相应的外汇储备规模不断扩大的一方，同样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经济对外失衡虽然受到全球经济失衡和东亚区域分工体系变化的影响，但也有自身的内部原因。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需要多边磋商，通过各国共同努力进行有序调整。中国也将通过自身的努力解决经济对外失衡问题，为调整全球经济失衡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经济的对外失衡，近年来主要表现为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和国际收支不平衡。这里主要分析造成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内部因素。

第一，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和企业所得份额增长高于居民所得增长。从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和企业利润增长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也可以直观地判断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和企业所得份额不断增加，这

就意味着居民最终消费能力相对于不断扩大的生产能力不断收缩,在国内市场难以消化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的情况下,过大的生产能力就要通过扩大出口来释放,必然加剧经济对外失衡。

第二,鼓励出口的战略和政策。长期以来,中国采取了鼓励出口的战略和政策,包括在沿海地区设立大量以出口为导向的开发区,通过优惠政策大量招商引资,实行出口退税和对出口企业给予信贷支持等鼓励出口的政策,造成国内资源配置向出口部门倾斜。而在宏观调控目标上对国际收支平衡重视不够,使得在政策上没有能及时矫正向出口部门的倾斜。

第三,资源性产品价格扭曲和投资成本过低。长期以来,中国水、电、油等资源性产品和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明显偏低,劳动力相对过剩也使工资水平难以上升,使投资和出口成本被过度压低,直接推动了投资和出口的过快增长。

第四,汇率弹性区间偏小和名义汇率调整作用有限。中国2005年7月实行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尽管名义汇率有所上升,但人民币汇率弹性区间偏小,加之国内通胀水平持续较低,在名义汇率升值的同时,实际汇率升值幅度有限。从理论上讲,升值可以减少出口,增加进口,降低升值压力。但是,出口下降会加剧国内产能过剩,进而压低通胀水平,使实际汇率水平低于名义汇率水平,又会进一步推动出口增长和外贸顺差扩大。

此外,多年来,财政货币政策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内部平衡目标,即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低通胀水平,提高就业率,缺乏兼顾内外平衡的政策目标,也使得外部失衡没有得到有效的抑制。

从未来一个时期政策选择看,汇率调整并不是解决经济对外失衡的主要手段,因为这不能改变国际分工的既有格局。最重要的是采取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取向,通过多种政策组合,减少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提高资源和